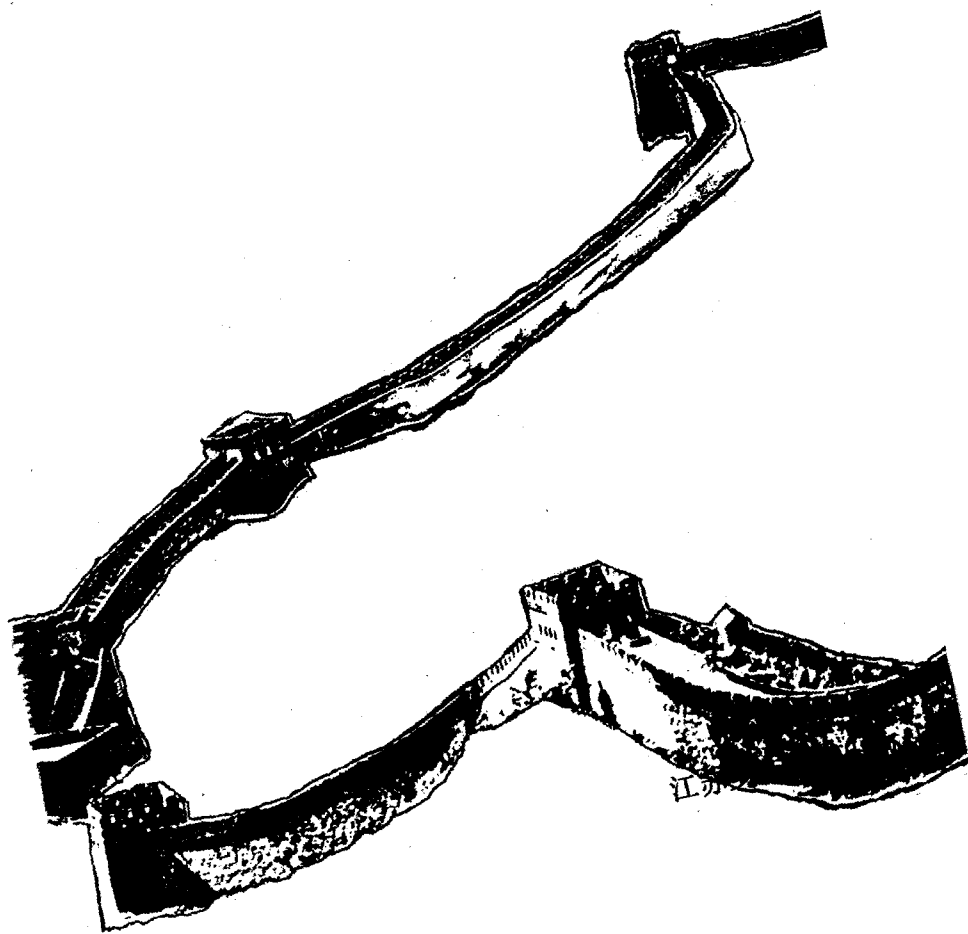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

血肉长城

第五辑



血肉长城(1-5辑)

出版发行: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五 四 印 刷 厂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8.5 插页 14 字数 700,000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346-1359-0

I·267 定价:40.00(套)

责任编辑:吴霄

凡是印装问题,均向承印厂调换。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第五辑

目 录

“救国会”的七君子·····	1
西安事变前后的杜斌丞·····	30
奔走团结 风雨同舟·····	48
人生谁无死 丹心照汗青·····	63
为抗日而奔走的高崇民·····	79
国歌的作者聂耳·····	92
与祖国同命运共呼吸·····	107
麦新的音乐创作道路·····	120
以笔作刀的金剑啸·····	135
华侨领袖 抗日旗帜·····	144
愿将身躯易自由·····	160
敌后抗日 誓死报国·····	176
晚节昭千古 狂澜励其生·····	189

“救国会”的七君子

1937年7月的最后一天，肆虐的烈日把天地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蒸笼。

在国民党江苏省苏州监狱大门前，伫立着数百名男男女女。他们的脸上，按捺不住兴奋与急切的表情，像是在等待某个重要时刻的到来。

下午五时许，监狱长恭恭敬敬地亲自陪着一行人走了出来。迈步在前的是一个六旬开外的老者，他个子不高，但是精神矍铄，额下长髯飘拂。在他身后跟着六个人，其中还有一位仪态端庄的年轻妇女。当他们面带胜利的微笑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已等候多时的人群欢呼起来，阵阵口号声响彻云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万岁！”

爆竹声震耳欲聋，激昂的军乐声如暴风骤雨，向这些为抗日救亡而在国民党监牢中渡过了七个月零二十七天的英雄们致以由衷的敬意。

这几位刚刚步出牢房的，便是驰名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他们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

“我们都是中国人！”

1935年的上海，寒气似乎比往常来得早些，才进入11月，马路边梧桐树的叶子便被剥落光了。路人们行色匆匆的，在冷风中瑟缩着……

沈钧儒先生坐在临窗的椅子上，阴郁地眺望窗外，心事重重。近来，他的心境很不好，感到十分疲惫。5月间，他的老朋友杜重远，因为所主编的《新生》周刊上刊登了《闲话皇帝》一文，日本人无端抗议，结果杂志被封，人被逮捕。国民政府还下了《敦睦邦交令》，讨好日本，压制国民的爱国运动。沈钧儒为了营救杜重远，抗议这种曲解法律、蔑视人权的行为，召集了律师公会执监委员会会议，发表严正声明，并联络同仁致函司法机构，提出强烈抗议。随后，他还曾亲赴南京，设法营救杜重远，为抗日救亡运动保持一分士气。

然而，一切却是显得那般徒劳，当局不顾全国各界的呼吁和抗议，判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并不准交罚金替代，上诉也被驳回。

想起“对于友邦，务敦睦谊”的指令，沈钧儒尤其愤懑：友邦，友邦，中国人连国家都要被日本人占领了，当局却竟然还一味讨好侵略者，把人民的手脚捆起来，使他们不能反抗，真是岂有此理！

“先生，最新的《世界知识》。”佣人送来了沈钧儒最喜欢看的杂志。沈钧儒默默点点头，接了过来，一翻目录，不觉为之一震，急急翻到载有老友邹韬奋写的《悼戈公振先生》（戈公振，江苏东台人、学者、爱国人士，1932年以记者身份随国际调查团去东北调查“九·一八”事件。后赴欧洲实地考察。1935年10月回国

后,在上海猝然病逝)那篇文章。

读着读着,老人的两眼湿润了。“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戈公振的临终遗言,重重地痛击着沈钧儒的心。他泪眼朦胧,情不自禁地把下面这段文字读出了声:“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虽是在极度疲乏之中,眼睛突然睁得特别的大,语言也特别的激昂,但因太疲乏了,终至力竭声嘶,沉沉地昏去。谁在此时看着这样的神情,都不免于万分沉痛中感到无限的悲壮,酸楚掉泪。”

几滴老泪润湿了黑字标题。“苍天不仁,丧此忠良!”沈钧儒在心里痛呼一声。当年“一·二八”事变时,戈公振昼夜奔波、组织支援前线的情景一一浮现在眼前。他感到胸闷,站起身来踱了几步,血液的流动在不断加快,使人想高声呐喊,想仰天怒吼。他急步走到书桌前,提起羊毫,笔酣墨畅地挥洒下《读邹韬奋悼戈公振先生文》:

浙江古越国,
勾践人中杰。
尝胆卧则薪,
我是浙江籍。

苏州有胥门,
炯炯悬双睛。
怒视敌人入,
我是苏州生。

哀哉韬奋作,
壮哉戈先生。

死犹断续说，
我是中国人。

写到这里，沈钧儒觉得只有一个声音在他耳边不停地高喊：“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戈公振圆睁双眼、紧抓着邹韬奋的手不放的情景，浮现在他眼前。沈钧儒的手颤抖起来，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全部激情在一句话上面迸发出来。于是，他把诗作的最后一节写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啪哒！”“啪哒！”一滴滴热泪掉在浓墨写成的字上，在许多地方浸润开来……

几天后的一天，沈钧儒正在对着诗作凝神沉思。佣人进来通报：“先生，陶行知先生等人来访。”

沈钧儒从半恍惚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忙说：“快请！”

“衡老（沈钧儒字衡山），上门讨教了！”随着招呼声，走进来六七个人。沈钧儒一看，是陶行知、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和钱俊瑞等，都是近来常在一起议论时局的朋友。

“各位前来赐教，不胜荣幸。”沈钧儒将大家迎进书房。

陶行知看到桌上的条幅，走过去仔细一瞧，笑容顿失，神情庄重地朝沈钧儒深深一拱手：“衡老，真是血泪之作啊！铁石之人，也不能不被感化呀！”

大家一起围过来拜读。沈钧儒说：“实在是戈先生的事，感人



七君子

这是“七君子”获释后在南京爱国老人马相伯家的合影。

自右至左：李公朴、王造时、马相伯、沈均儒、邹韬奋、

史良、章乃器、沙千里、杜重远。

至深呀！韬奋兄，也应当感谢你，将如此爱国情景真实地告诉国人。”

邹韬奋激动起来：“一想起那情景，我就忍不住热泪外涌。这些天，我老在心里说：我也是个中国人！我也是个中国人呀！”他哽咽着说。

沈钧儒沉重地吐了口气，说：“‘北望中原涕泪多，胡尘惨淡汉山河。’目睹今日国势，谁人能不长歌当哭！”

李公朴一扬手，激愤地说：“‘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是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决不能再这样听任贼寇猖狂、奸佞误国了！”

“说得对！”钱俊瑞插了上来。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张报纸，递给沈钧儒，说：“衡老，请看这个。”

沈钧儒接过来一看，是巴黎出版的10月1日的《救国报》，上面醒目地刊登着中共《八·一宣言》。沈钧儒一口气扫视读完，激动地说：“说得太好了！当今中国，唯有实行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神州方可免去陆沉之忧！”

“先生所见极是。”34岁的沙千里是沈钧儒在上海法科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对沈先生一直非常尊敬。这时，他接上来说：“先生昔年常常教诲我等，应当效法仁人志士们，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值此危急存亡之秋，千里虽驽，敢不投袂而起！”

王造时紧跟着说：“肉食者鄙！国家是全体中国人的国家，韬奋兄说得对，我们也都是中国人，必须对国家尽应有的责任！”

钱俊瑞说：“必须向国人昭告我们的主张，唤起民众共同救亡。”他转向沈钧儒，恳切地说：“我们认为，必须组织起来拧成一股绳，才能有力量。衡老德高望重，请您牵头吧！”

在大家的一片推举声中，沈钧儒慨然答应下来：“我本来精力已不济，但在这国难深重的时候，只要对救亡有益的事，都义

无可辞。为了救亡，我这老兵愿洒尽最后一滴血！”

12月12日，沈钧儒等人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庄严宣告：“在此生死存亡绝不相容的关头，负着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救国运动。”号召“全国民众立刻自动组织起来，采取有效的手段，贯彻我们的救国主张。”

大潮，在黄浦江上涌起，澎湃向前。

大潮澎湃

1935年12月21日下午，在上海北四川路青年会的礼堂里，在一千多双眼睛的注视下，一个剪着短发的青年妇女正在台上演讲。

盯着一张张激动的脸，青年妇女慷慨陈辞：“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民可以受人压迫，任人残杀；土地今天被人割去一块，明天被人抢去几省；我们的内政外交，没有一件不受人家的强制，人家的干涉。这还能叫做国家吗？还能成为国家吗？我们居人民半数的妇女，还能装痴装聋躲在家里过苟且偷安的生活吗？……难道就甘心在家里期待亡国奴的生活来临吗？”

说到这里，她顿了顿，接着用力猛一挥手，斩钉截铁地说：“不！决不！今天我们上海各妇女团体和每个妇女，在此总集合，就是我们中国妇女救亡运动的开始。”

雷鸣般的掌声席卷全场，经久不息。演讲者和台下许多姐妹一样，感到浑身的热血在奔涌，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这位演讲者，就是著名的女律师史良。早在1919年，她在常州的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习时，作为女师的学生会主席，便积极带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1927年她从上海法科大学毕业

后，曾积极从事妇女解放运动，并在军队工作过，因思想进步而被捕。从1931年起，她在上海开始律师生涯，努力为受压迫受侮辱者辩护，同黑暗势力斗争，因而声誉日著。其间，她曾积极参与营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左翼作家艾芜、地下党员任白戈，就是在她的营救下而获释的；共产党领导人邓中夏和贺龙的家属向元姑等人，也是她在法庭上为之有力地辩护的。她的才干和品质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在这天的上海妇女救国会成立大会上，史良被推为理事之一。

大会以后，上海各界妇女和民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游行示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的愤怒口号声在上海滩上空久久回荡。

在这样的时代，中国人都真切地感受到了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危机，哪怕是一句口号、一首歌，都能使人热血沸腾，激发出全部热情，振奋起战斗牺牲的精神。热泪盈眶的行人，纷纷加入游行的行列，扩大着这支爱国者的队伍。

几天以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等人领导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了。接着，沈钧儒、王造时、周新民等组织的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沙千里等组织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陶行知等组织的国难教育社纷纷成立，救国运动锐不可挡地向前发展。

1936年1月28日，是“一·二八”事变四周年纪念日，各界人士八百余人在上海市商会召开了纪念大会，沈钧儒被推为大会执行主席，章乃器、李公朴、史良等人都是主席团成员。他们相继在会上发表了演说，王造时更是沉痛地指出：“我们到今天损失的土地，有现任行政院长蒋介石先生的老家浙江省的十八个省大。”这时，会场上群情激昂，人们悲愤难忍，抗日救国的情绪高涨极了。会上，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会后，全体代表

步行至庙行，公祭无名烈士墓。年过花甲的沈钧儒走在最前面，步履稳健，义无反顾。他目睹群众奋不顾身投入救国运动中，心里无比兴奋：中国民心未死，谁也灭亡不了中国！

这年5月31日至6月1日，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各界代表，在上海圆明园路女青年会聚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和史良等，都被选为常委，邹韬奋也担任了执行委员。爱国救亡运动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指导中心。

一天，冯雪峰、章乃器、邹韬奋等再次前来拜访沈钧儒。

四月下旬冯雪峰由陕北到上海之后不久，就曾与沈钧儒畅谈过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天见面后，冯雪峰高兴地对沈钧儒说：“衡老，数月以来，民气伸张，爱国热情高涨，救国会组织和团结民众，于国家建功甚伟。衡老日夜操劳，青年人也自愧不如呀！”

沈钧儒谦逊地说：“老迈之躯，精力不济，是群众在激励我感召着我。救国会的事，靠的是乃器兄他们，这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

冯雪峰的语气转为沉重：“华北局势，已是如箭在弦，而国民党中央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倾力进攻红军，做万民痛心而敌寇快意的事。如此下去，国何以堪！”

“衡老年初在《大众生活》上发表的《四年间的清算》一文，足以振聋发聩、警醒顽石。”邹韬奋继续赞叹说：“尤其是‘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到今朝还要顾虑个人的死活，那就不能算是人了’这一句话，真使人如醍醐灌顶哪！”

“诚如共产党所言，我国家和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章乃器从心底赞同《八·一宣言》的主张。他转向冯雪峰，语气坚定地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今

天中国唯一的希望所在，我们应当竭尽全力而为之。”

邹韬奋从皮包中掏出一叠文稿，说：“要制止内战，团结御侮，唯有进一步唤起国人共同努力才能达到。我们草拟了一篇文章，言为心声，不吐不快，还请衡老与乃器兄斧正。”说着，他把文稿递给了沈钧儒。

沈钧儒大略浏览之后，爽朗地说：“所写正是我肺腑之言，定当仔细拜读。乃器兄是大手笔，斟酌之事，唯他堪任。”他看到后面邹韬奋、陶行知已签好了名，风趣地说：“看来，我得更鼓余勇，否则在爱国上就要落后啰！”

8月5日的《生活》周刊上，发表了由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四人署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篇文章公开响应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号召，强烈要求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指出抗日救国是关系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必须集中一切人力、财力、智力和物力，实行全面的动员，去争取最后的胜利。文章号召各党各派捐弃前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沈钧儒等人的这篇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主张抗日救国的民主人士的观点，在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中都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时之间，人们争相传阅，以先睹为快。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借以广为传播。

8月10日，毛泽东发表致沈钧儒等人和全体救国会会员的公开信，指出救国会的文件“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作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和要求，我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表示诚恳的敬意……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

在救国会的纲领上签名,要求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各地的救国组织和各种形式的救国运动。

鲁迅运动

1936年10月19日,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鲁迅先生永远放下了他那支战斗的笔,与世长辞了。

在极度的悲痛之中,中共上海办事处负责文艺界工作的冯雪峰找到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商量如何组织对鲁迅这位伟大的文化战士的吊唁活动,激励人们踏着先驱者的足迹继续前进。冯雪峰如果出面,必定会被像野狗一样四处乱嗅的特务发觉,不但鲁迅的丧事将难以料理,冯雪峰的生命还会白白牺牲。宋庆龄思索着:这事让谁来承担最妥当呢?蓦地,一道亮光闪过她的脑海,“对,找沈钧儒先生!”宋庆龄的提议,立即获得了冯雪峰的大力支持。

鲁迅先生的遗体,安详地躺在万国殡仪馆里。在救国会的组织下,各行各业的人士排着长长的队伍,同鲁迅做最后的告别。不少以前从未见过鲁迅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泣不成声地向这位永生的战士致敬。沈钧儒和蔡元培、宋庆龄等人组成了治丧委员会。他们悬挂在灵堂中的挽联表达了万众的心声:“这世界如何得了,请大家要遵从你说的话,彻底干去;虽躯体有时安息,愿先生永留在我们心头,片瞬勿离。”

22日下午,在万国殡仪馆门前,密密地排满了为鲁迅送行的人群,一朵朵佩带在人们胸前的素洁的白花,在寒风中不停地颤抖。下午二时,在黄源、巴金、胡风等十四位作家的托持下,鲁迅的灵柩缓缓出了灵堂。顿时,天地间的其他一切运动仿佛都停止了,人们强忍的热泪再也无法控制夺眶而出。一排排的学生、

工人、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都在心底悲怆地呼喊：鲁迅先生，您去得太早了！在这抗敌救亡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我们是多么需要您这样睿智而坚强的战士啊！

在写着“鲁迅先生殡仪”几个令人心碎的大字的横幅引导下，灵车和送殡的队伍行进在大上海的马路上。巨幅遗像上，鲁迅先生的目光依然是那么慈祥而深邃，又透着几分冷峻。在灵车后面，紧跟着的是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史良等人。在他们身后是排了两里多长的数万人的队伍。

哀乐低回，悲壮的挽歌震动着人们的心扉：

你的笔是枪尖，
刺透了旧中国的脸。
你的发音是晨钟，
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
在民族解放的战斗里，
你从不曾退却，
擎着光芒的大旗，
走在新中国的前头，
……
啊，同志，
我们踏着你的路向前，
那一天就要到来，
我们站在你的墓前，
报告你，我们完成了你的志愿。
愿你安息，安息，
……

歌声渐渐变得高亢，人们的耳边，响着先驱者的声音：“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鲁迅先生生前的救亡主张，早已通过组织吊唁活动的救国会，以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名义用传单散发出去，为广大群众所熟悉了。

“鲁迅精神不死！”“纪念鲁迅先生，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一声声怒吼从长长的队伍中爆发出来，响彻苍穹，震荡着大地。

鲁迅先生的墓地选定在虹桥公墓，是由沈钧儒出面购妥的。下午五时，送殡的队伍到达这里。

丧仪开始后，首先由主席蔡元培致词。随后，沈钧儒也发表了演讲，他指出：“鲁迅先生虽得不到什么国葬，但今天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葬礼，鲁迅先生一定在地下高兴！他今年还只有五十六岁，假使他多活几年，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领导我们，完成民族解放运动的！”宋庆龄也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鲁迅先生是革命的战士，我们要遵着他的路，继续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汉奸，完成民族解放运动！”

章乃器进一步号召：“纪念鲁迅先生，我们必须发起一种鲁迅运动。第一，使没有参加联合战线的人，都觉悟了来参加；第二，应使每个人每天都能做一小时有利于民族解放的工作；第三，每个人都应该学鲁迅先生的样子，为全世界被压迫者讲话，而且至死不屈！”

“鲁迅精神不死！”“中华民族永生！”激昂的口号声，扫净了墓地的森郁，驱除了暮夜的阴冷。

在一面黄缎做成的旗子上，嵌贴着黑色的“民族魂”三个醒